

宋庆龄与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

朱敏彦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一场经济救亡运动。它对于组织人民大众，开展生产自救，克服经济困难，支援长期抗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曾有“经济国防线”之誉。宋庆龄以她的崇高威望和杰出才能全力支持和积极促成工合的兴办，对工合运动的蓬勃开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支持筹建工业合作协会的理想，积极促进“工合”运动的兴办

中国工合的最初发起人是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原名海伦·福斯特)。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斯诺夫妇和艾黎他们目睹“一只只日本的货船，已经载满了抢劫来的机器和废铁，准备运回他们的岛国”，“从战略上破坏中国的工业基地”^①。造成中国战时军事和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的局面。他们决心改变这一状况，经过多次商讨，产生了一个“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难民的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②合在一起的工业合作社的方法。这一设想当即得到宋庆龄的赞同和支持。

宋庆龄认为兴办工业合作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它能够“吸收大批的难民，并且将日本占领区内不事生产的难民救济所的几百万经费转移过来”，发展中国的中小工业，其次，“能够维持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与匪患，”再次“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另外，这可是最重要的，“工业合作社能够支持长期抗战，使日本对于占得城市丝毫无利可图”^③。为此，当艾黎、斯诺他们还在酝酿筹办工合时，宋庆龄不但表示“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一事业，而且主动提出愿意做发起工合的保证人。^④宋庆龄凭借了她的聪明的智慧及无误的直觉，看到工业合作社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然而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即民生主义^⑤。

在宋庆龄的支持和鼓励下，艾黎他们很快制订出一份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工业合作社的计划草案，并在由中外进步人士参加的“星一聚餐会”上进行讨论，专门加以研

① 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② 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斯诺文集》第三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4、69页。

③ 《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

④ 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99—103页。

究。大家认为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应取得国民政府的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以便顺利进行，同时也必须保持这个组织的群众性，这样，才能调动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性，并可以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宋庆龄对这一意见十分赞同，经她联系，取得了宋子文在财政上的援助，替工合筹划了初建时急需的资金。同时，也由于宋庆龄对工合的支持和赞赏，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柯尔爵士消除了曾一度有过的疑虑，表现出对开展这一事业极大的热情和支持^①。

这时，克拉克·柯尔大使正欲动身前往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武汉，艾黎他们便将组建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交给了克拉克·柯尔大使，托他转呈国民党政府。一到武汉，克拉克·柯尔大使就将这一计划交给了宋美龄和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并向他们成功地介绍了这一设想，引起他们少有的兴趣和关注。这时的蒋介石和孔祥熙等人，为了利用工合将会在国内发生的影响，在当时武汉地区浓厚的抗战气氛的推动下，再加上克拉克·柯尔、端纳和宋美龄等的鼓动，最终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并答应由国民政府拨给资金500万元，作为开办基金。

在宋庆龄的支持和促进下，经过国际友好人士和国内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8月24日，中国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正式成立，这样，工合运动就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发展起来。

全力宣传“工合”的性质、作用，呼吁国内外人士支持中国“工合”

中国工合开展之初，宋庆龄通过演讲、著文以及与国际友人通信等各种场合宣传工合的性质、作用，呼吁国际友人、援华机构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大力援助中国新生的工合事业。

正当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之时，8月15日，宋庆龄便通过广播演讲，向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介绍了中国工合运动。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毁坏和攫取了75%的新式工业，造成100余万在业工人失业的罪恶行径后，指出，中国人民对此并没有失望和屈服，他们决心在战争中，要把被日本所毁坏的生产力重建起来。“我们打算在所有内地，甚至在日本所占据的铁道两旁建起成千成百的小工厂。为要推动我们的人民广泛参加这个共同斗争，为要使他们牺牲得有意义，并且使这个运动有充分的民主性质，它是以合作社的方式开展着的——是政府与消费者共同经营的”^②。她呼吁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和人士，尽他们的最大力量，支持和援助中国这一新生的进步的工业合作社运动。

为了争取更多的捐款，宋庆龄还多次写信要求国际友人支援中国工合事业。1939年5月1日，她在给全世界朋友的一封信中呼吁他们“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4万个流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往往是相互的。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支持着中国的长期抗战，这正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道义上和行动上的支援。因此，“我们有权这样要求你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帮助着他们。而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的、强大的和民主的中国，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③。

①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102—108页。

②《新华日报》1938年8月24日。

③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中国工合运动开展一年之际，1939年12月10日，宋庆龄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推进社名誉社长的身份，在香港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指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重要性，不单只是重建社会，它更可以促成经济的改善。”“若从社会和经济的立场上说，它是无价之宝，由于这种扩大的组织，人民的经济程度一定迅速高大。此外，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更可以消除东方劳力廉贱的传统陋弊。单此一点，便足裨益世界不浅”。“它的目的是人类的复兴，经济的改进和培养民主教育”^①。

1940年4月，宋庆龄从香港来到四川，曾先后视察了重庆、成都等地的工业合作社。当她来到成都工合事务所，了解到该所成立虽然仅一年，却已扩展到50多个生产合作社，十分高兴，鼓励他们说：工合运动的开展：“正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广大工合社员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②。

宋庆龄还通过她领导的福利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海外援华机构和个人介绍中国工合的情况，并呼吁：“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并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实现自助的人们，你们应当关注于中国工合。保卫中国同盟将代为接受你们援助工合的基金，或者是给任何地区的专项捐款，例如在日本占领的游击区里的‘战地工业。’”^③

通过宋庆龄和她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对中国工合的介绍，呼吁海内外人士援助工合，使新生的进步的工合事业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进步人士所了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合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开展。在1940年到1941年，工会总会先后设立了西北区办事处（陕西宝鸡）、晋豫区办事处（河南洛阳）、东南区办事处（江西赣州）、浙皖区办事处（浙江兰溪）、湘桂区办事处（广西桂林）、滇黔区办事处（云南昆明）和川康区办事处（四川重庆）等7个大区一级的办事处。这样，一条漫长的工合线，便一路从东南敌后的游击区直伸入西南、西北大后方，从蒙古高原直至云南山地，工业合作社星罗棋布地出现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18个省的大半个中国广阔大地上。这种新生的工业以一星期25所的速率出现，“以致昨天的资料还没印出来就已经是陈旧”^④。据不完全统计，到1942年6月，工业合作社的分布情况为：西北区共建立325个合作社，4019名社员；西南区246个合作社，3485名社员；东南区433个合作社，5395名社员；川康区247个合作社，4800名社员；云贵区158个合作社，2497名社员；浙皖区68个合作社，874名社员；晋豫区118个合作社，1610名社员。七个区共计1595个合作社，22680名社员^⑤。从事着纺织、服装、化学、矿冶、机械、五金、土木、卷烟、制糖、印刷、燃料、手榴弹、军服、农具等各类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生产。工业种类共可分10部分，计114项，其中纺织最多，占34%、化学19%、服装12%、矿冶10%、土木7%、食品5%、机电3%、文化3%、交通工具1%，其它杂项6%^⑥。整个工合每月生产总值达24022944元（法币），社员股金5645558元，总会和银行贷款15727857元^⑦。

①《大公报》，1939年12月11日。

②《新华日报》，1940年4月19日。

③《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8—1939年》（英文版），1939年香港，第34—37页。

④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斯诺文集》等三集，第153页。

⑤陈翰笙：《中国合作社史话》，《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⑥吴承洛：《中国战时工业概观》，《中国工业》第六期，1942年6月25日。

⑦陈翰笙：《中国合作社史话》，《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发起建立“工合”国际委员会，努力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援助

中国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也赢得了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的深切同情和鼎力相助。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捐款和物质援助，同时也为了避免国民政府的官僚“控制全部海外捐款”，“建立官僚主义的工合组织”，推动工合运动进一步健康发展，经宋庆龄倡议，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由于宋庆龄的声望和影响，香港地区的许多中外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该会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香港的英国主教何明华为主席，陈翰笙为秘书，陈乙明为司库，斯诺、艾黎、卡尔森、普律德等国际友人和香港中国银行行长郑铁如以及宋之文、何东等20多人为委员。

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宋庆龄立即着手在国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使国外援华机构和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能更有效地开展。艾黎曾说过：宋庆龄是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亦是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又是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主席。受宋庆龄的委派，斯诺夫妇、艾黎、普律德女士等国际友人分赴世界各地筹建各地工合促进委员会。斯诺同其夫人尼姆奔赴马尼拉筹组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

斯诺夫妇来到马尼拉之后，由于宋庆龄的声望，很快就成立起一百多人组成的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由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夫人塞尔担任名誉主席，博雷博士为主席，但诺尔先生为总干事。该会成立之初，当即筹募捐款20余万元汇交宋庆龄收转中国工业合作社。接着，斯诺夫妇又赶到菲律宾著名的避暑胜地碧瑶，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宋庆龄又委派艾黎前往碧瑶，协同斯诺夫妇开展宣传活动。艾黎抵达碧瑶后，多次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宣传工合运动的意义，深深激起菲律宾友人和华侨的热情，纷纷慷慨解囊，艾黎在菲律宾逗留不到两周，就带回15万元的捐款。

普律德女士奔赴纽约，筹组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该会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亲任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将军任主席，普律德女士担任秘书，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为委员。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在海外各国中是最大的，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纽约等主要城市都设有分会。罗斯福总统本人对工合也十分关心，1942年2月24日，罗斯福在白宫接见斯诺，以极大的兴趣听取斯诺对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作用和意义的介绍后，当即表示在给蒋介石去信时，要向蒋介石表明他个人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强烈兴趣，并要求得到一份工合发展情况的报告。两年后，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还专门向蒋介石夫妇问起工合的发展情况。^①

宋庆龄还派员赴伦敦，推进英国援助中国工合活动的开展。英国建立的援助中国工合组织取名为英中合作发展公司，表示英国在战后仍希望同中国工合保持长期的经济技术合作的联系。该公司推英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夫人为名誉主席，工党政府交通运输大臣、国会议员巴恩斯为主席，英国《新政治家和民主》杂志编辑吴德满女士为秘书。此外，宋庆龄还派员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建立工合促进机构，向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提供大量援助。

工合国际委员会和国外促进委员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宣传中国战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以及工合对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作用。这样，一方面扩大了中国人民神圣抗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联系，从而推动了同情中国抗战的

^①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9—170页。

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侨募集捐款活动的开展。整个抗战期间，英国对工合的捐款约在10万英镑以上，美国约300万美元，连同港澳、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各地在内，海外捐款总额共计是500万美元。^①从而，在资金、材料、设备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

在宋庆龄的组织下，工合国际委员会与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共同举办了许多活动，筹集募捐资金，援助工合事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41年7、8月间举行的持续两个月之久的“一碗饭运动”。“一碗饭运动”最初是由旅美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发动的募捐活动，后英国伦敦也曾举行过类似的活动。宋庆龄决定通过“一碗饭运动”，在香港地区为工合举行大规模的募捐。

1941年7月1日 宋庆龄在香港英京酒家主持了规模盛大的“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在港的中外人士150余人出席。宋庆龄在开幕式上作了演讲，阐明了举办“一碗饭运动”的意义。她指出：“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②。开幕式上，宋庆龄捐献了她多年来一直珍藏着的孙中山生前喜爱的墨宝、文物和纪念品，当场义卖。许多银行界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踊跃购买，后来采取了拍卖的方式，不多时这些珍品被争购一空。

“一碗饭运动”开展后，香港的许多饭店酒家茶室义卖炒饭，各阶层爱国人士积极认购饭券。从爱国华商、名门闺秀到普通职员、店员，甚至贫寒的学生，以及在港的许多国际友人包括香港当局的官员和军官兵士，也都热烈响应，踊跃认购，就连香港总督也表示赞助。一时间，香港举城皆谈“一碗饭”，以购买这一“救国饭”、“救灾饭”为荣。在这场募捐活动中，宋庆龄的名望是个极为重要的动因，当时有许多人就是为了能得到宋庆龄在捐款收据上的亲笔签字而慷慨解囊的。这次义卖募捐活动，共募捐到22144元港币，615元国币，英国驻华会香港分会又补赠2000多元港币，共凑足25000元港币。这些钱款全部捐赠给中国工业合作社，用于发展工合事业。

筹募大量资金、设备、物资，支援和推动抗日根据地“工合”运动的发展

国民政府对工合的支持，主要局限在国统区，其拨给工合的经费，也几乎全部资助国统区的工业合作社。据1940年初的调查，解放区的工合数量占全国工合的六分之一，所得贷款仅占四百分之一。^③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政府由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对工合运动也由支持到应付，甚至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工合活动加以歧视和压制。但是，在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努力下，在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解放区的工合运动终于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

工合国际委员会通过西北区办事处把大部分捐款汇交解放区。仅1940年初这一次，宋庆

①卢广锦：《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71辑，第126页。

②《华商报》，1941年7月17日。

③《新华日报》，1940年2月24日。

龄就将斯诺夫妇在马尼拉募得的10万元捐款，提供给陕甘宁边区，用来发展边区的毛织工业合作事业^①。宋庆龄还安排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陈翰笙，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部分捐款转到延安。连绵不断的捐款通过各种途径送往解放区，促进了解放区的工合事业的发展，工业合作社的生产能力也由此不断增长。至1942年9月底，延安地区已发展有41个工业合作社，共1041名社员，入股资金已从1941年的669314元法币增加到3434040元。工合每月的产量为：270条羊毛毯，600条棉毯，14493包色布，2466包粗布，1325双毛袜毛鞋，1500顶毛帽，325只羊毛袋，30000条肥皂，16796包牙粉，3250市斤面粉，1400磅豆粉，6000磅植物油，3888磅盐，257箱纯碱，605磅酒精，2043磅粉笔，5250瓶墨水，550000张纸^②。工合的这些产品极大地补充了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不足，对于解放区克服经济困难，争取经济形势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解放区的工合还拥有一些铁矿、煤矿、制造厂、铁工厂、制药厂、运输站和油井等行业。据1945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解放区先后建立了包括40余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230多个。这又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工合国际委员会也经常委托西北工合承制大批的棉军衣、棉坎肩、背包、军鞋等。1939年，宋庆龄曾一次委托西北工合承制10万件棉衣，当时宝鸡、西安等地的纺织、服装工合组织不分昼夜地赶制出来，打包托运给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③。工合根据需要，必要时还迁进一些生产军需物资的合作社到解放区。一次艾黎受宋庆龄的委派，为开展工合工作到延安，从毛泽东那儿了解到晋西北的贺龙部队缺乏制造手榴弹的铁料时，就想方设法，从晋东南迁一个炼铁合作社到晋西北，帮助贺龙部队制造手榴弹等军用物资。对于宋庆龄领导下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给予解放区的大力相助，毛泽东曾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他深信，只要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坚持中国与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④。

宋庆龄对战斗在华中敌后的新四军也给予很大的帮助，她多次嘱托艾黎到新四军活动的东南地区发展工业合作社。为此，艾黎多次奔波于浙江金华和安徽屯溪一带，筹建工合浙皖区办事处，经过艾黎他们的努力，1939年春，在距皖南新四军驻地附近的兰溪建立了工合浙皖区办事处。这为把工合办到新四军驻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支援新四军抗战，工合浙皖区办事处主动同新四军联系，要求新四军派人参加工合工作，为此，新四军政治部先后派了叶建明、侯蔚文和蒋传源等前往工合工作。为了把工合直接办到新四军驻地，1939年10月，工合在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心泾县茂林镇办起了泾太（泾县和太平县）事务所，尔后的7、8个月中就在茂林地区先后办起了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烧炭、竹器等十几个合作社，在这些合作社中还有残废军人组织的雨具合作社。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新四军军需之用。如造纸合作社生产的纸张供应新四军印刷《抗敌报》和印文件之用，从而打破了敌人对新四军重重的经济封锁^⑤。为了支援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的临时工厂输送技术力量，宋庆

①《新华日报》，1940年2月24日。

②《保卫中国同盟报告》（英文版），1943年重庆，第49～50页。

③卢广彬：《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71辑，第119页。

④《艾黎自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⑤蒋传源：《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38页。

龄还先后两次委派艾黎亲自到皖南新四军驻地，指导皖南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工合在皖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的大力赞赏。叶挺曾专门寄信给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感谢工合在皖南组织合作社，高度评价了工合对新四军的有力支援，赞誉“皖南工业合作社给予我们重要的援助。这些工业使我们区里的难民得以生产自救。它们帮助我们利用本地的原料，使不致落于敌人之手。因此，我们能够抵挡敌人货物之侵入，并有可能自给自足，使皖南人民得到了好处”^①。为此，叶挺认为工合在皖南开展的这一切活动，有力地支持了新四军长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增强了部队对敌斗争的物质力量。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宋庆龄始终关心和支持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由于工合给予八路军和新四军很大的帮助，由于工合中的中外进步人士宣传坚持团结、加强统一战线，这都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他们诬陷、迫害工合中的进步力量。1942年，国民党就曾以“与共产党共同搞阴谋”、“帮助新四军”等名义，解除了艾黎长期担任的工合技术顾问的职务。对此，宋庆龄坚决回击国民党方面对工合的迫害。一方面她排除种种干扰，努力安排那些受到国民党打击的进步人士如艾黎等到工合国际委员会工作；另一方面，抵住种种压力，撰文介绍工合事业，尤其是抗日根据地工合事业取得的成就，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强加于工合的种种诬陷，进一步引起国内外进步力量对工合事业的关注和支持。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工合运动。总之，宋庆龄为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作出的功绩是无与伦比的，是举世卓著的。

.....

（上接第6页）

忽然自立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需要有教师及家长的正确引导，教师的职务就是“教人学做主人”，进行“主人的教育”，让学生过“主人的生活”^②。同时，作为教师或家长，要教儿童自立立人，首先自己就得自立主人；要教儿童自助助人，首先自己就得自助助人，那么在这些教师和家长的引导下，学生自治定能施行，自我教育的精神定能养成。

陶行知先生一生从事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多种切合我国实情的教育思想，采用了多种行之有效的教育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对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其中尤以学生自治为最。今天，随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学生的自我意识，已成了教育界普遍关注的一大课题。在此基础上，让我们一起学习陶行知先生关于学生自治的有关论述，无疑对深入进行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带来一定的启迪。

^①路易·黎艾：《保卫中国同盟与“工合”》，《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②《护校宣言》，第2卷第219页。